

1867年,他预言清朝50年内崩溃

1867年,时已晚清。

如果不是曾国藩回乡组织湘军拼死镇压太平军、不是他开启引进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晚清不可能出现所谓“同治中兴”,清王朝可能更早就寿终正寝了。然而,尽管他对清王朝忠心耿耿、效死犬马之劳以保其江山社稷,但与机要幕客赵烈文的一次小小论辩,却使他开始忧虑清王朝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其寿命到底还有多长。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他与曾的这次谈话及此后曾国藩对清王朝命运的思索。

只要有紧急繁忙的军政事务,曾国藩晚上往往喜欢与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口身无口。’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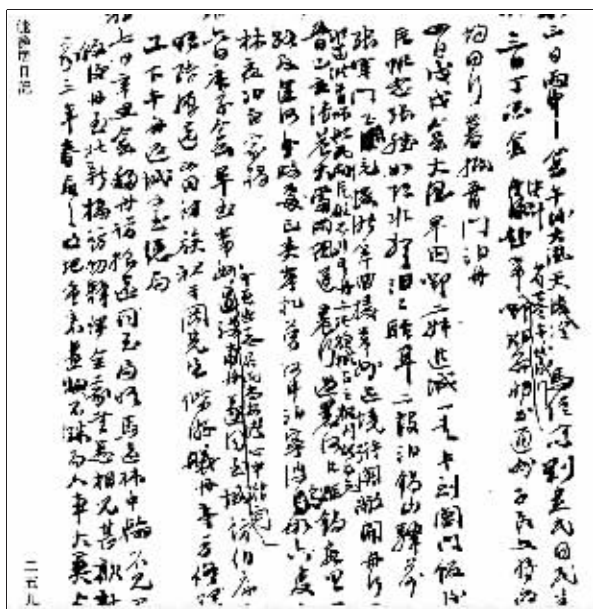
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割。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

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为康、乾、嘉——的“君德”虽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乏。

对赵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沉默很久后才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宗庙”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宗庙之陨”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

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曾对此问题看法仍十分复杂矛盾。虽然有时承认现在“朝无君子,人事俄乱,恐非能久之道”,但有时又对清王朝仍抱某种希望,认为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訢为人聪颖、慈禧遇事“威断”,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而赵烈文则坚持己见,认为奕訢“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要想挽救颓局,像现在这样“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影印稿一页 资料图片

赵烈文简介

赵烈文(1832年~1894年)乳名来求,字惠甫,一字伟甫,江苏常熟人。号能静,室名天放楼。是曾国藩手下最受器重的幕僚。赵烈文年少时即有才名,实际上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而且对佛学、易学、医学、军事、经济之学都有涉猎,是属于那种有实学的人。

咸丰五年,曾国藩坐困南昌,随行的幕僚大都逃走。周腾虎推荐赵烈文入幕。赵烈文正好闲赋在家,于十二月到了大营。

曾国藩可能也感觉到这个书生有个性,也可能是为了折一下他的傲气,命其参观驻扎在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让这个书生开开眼。没想到,这位赵先生回到大营,不但没被镇住,还提了一堆意见,他居然很不客气地说:樟树营

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对这位赵先生心里不大高兴,因为曾国藩最见不得说大话的书生。也正在这个时候,赵的老母有病,赵可能也看出曾的心思,所以就以母病为由,向曾国藩辞行,曾国藩也没有怎么挽留。这意思已经很明显,赵烈文回家走人就是了。

偏偏凑巧的是,就在赵要走而未走的时候,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大败的消息。赵也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向曾辞行,曾国藩请赵烈文讲出为什么看出周凤山湘军不可倚重的道理,这一下赵烈文只是含糊地说一些不幸言中的话。后来赵母病逝,赵烈文回家奔丧。此事一过,以曾氏的聪明,已经对赵烈文有了一番新的看法。时间一长,赵在曾的大营里越来越受曾的器重,经常商谈军事,最后到与曾无话不谈,有时一日几次。

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默运天心”颇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但在此更可将其理解成一种“天道”、某种“历史规律”,现在局面如此不堪,如无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仅靠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实则无济于事,而奕訢、慈禧均非能对体制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难免分崩离析的命运。

赵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见,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奕訢、慈禧的“幕客”,对此二人的判断却准确异常,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奕訢确实是朝廷中少有的开明权贵,近代初期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与他有关,因此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清王朝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却坚决反对,证明赵在1867年对他作的仅“小智耳”的论断不虚。慈禧乃至大清王朝以后不断为其“威断”所蔽所误已为众所周知,无须再赘。赵的眼光,确实老辣。

不过,曾对赵的论断仍无法或不愿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总还有一线生机,尤其是当不久朝廷下谕依总理衙门奏请令督、抚、将军对外交问题开诚布公畅所欲言时,曾国藩兴奋异常,认为这是当政者将振衰起弊之兆,清王朝振兴有望,最起码可以像东晋、南宋那样长期偏安。

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由于直隶管辖京城四周,曾国藩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訢及文祥、宝甲等高官,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对此,他当然倍感荣耀,直隶总督之职位不仅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而且使他能对全国的形势有更多了解,这时他才知道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

力挽狂澜之人。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他对刚刚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訢、文祥、宝口、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分析点评的结果是他们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他们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加庸碌无为,曾国藩不禁哀叹清王朝的未来“甚可忧耳”。这种局面,正是一个衰朽政权用人制度“逆淘汰”的结果,但反过来,这种“逆淘汰”又会加速这个政权的衰败。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彻底垮台正好四十又四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赵已分别于1872年和1894年去世,并未看到自己的预言、预感“成真”,对他们来说,这或许倒是一种安慰。因为虽然预料到清王朝行将就木,他们也只能做大清王朝的孤臣孽子,难有他选。

附:赵园简介

赵园,位于常熟老城区西南隅,建于明代钱氏“小辋川”遗址。清嘉庆、道光间,吴峻基筑水壘园,又名水吾园。同治、光绪年间为赵烈文退养故里之后购得并增建,人称“赵园”“赵吾园”。民初归常州盛氏所有,为天宁寺下院,又名“宁静莲社”。当年总体格局与多数景点基本保存,以水面为中心,又借景虞山,景点众多,为江南古典名园之一。前临里九万圩,与曾园为邻,十里虞山遥向其背,天然借景,构思精巧,别具特色。(本报综合广州日报等报道)

国学的原义、演变及内核



国学见于周代教育

国学,见于周代,其原义是指国家所设立的教育机构和学校。“国学”一词,出于《周礼·周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与之相似的还有《周礼·周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这里的“国学”,就是指国家的高级教育机构和学校。周代的教育,有国家教育与地方教育之分。地方教育称“乡学”,学校类型有“校”“序”“庠”,设在地方的自治单位“乡”“遂”之中,并由司徒和遂大夫职掌。国家教育称“国学”,设在王城,由乐师、大司乐等官职掌。可见,国学的原义,是指周代中央设在王城的国家教育机构和学校,它与地方的乡学相对。

国学有“小学”和“大学”之别

周代国学,又有小学和大学之别。按照《周礼正义》所述,周王国的国子,建在王宫南大门的左边,由师氏职掌。而王国的大学,建在国都之南郊,包括辟雍、上庠、东序、瞽宗和成均五所,由大司乐职掌。小学和大学的学生称为“国子”,主要是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之嫡子,他们皆贵族子弟,以与乡学中的平民子弟相区别。子弟八

岁入小学,教育内容主要是“六艺”之文和基本的生活规矩。国子十五岁从小学升入大学(大学的国子还包括乡遂所推荐的贤能),在大学里,他们因时因地依次到辟雍、上庠、东序、瞽宗和成均之中学习干戈乐舞、礼仪典章,大约九年之后毕业。大学教育的目标和步骤,按《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论学取友,谓之一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可见,大学教育之道,就是要让贵族子弟获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才德。在周代,由于大学教育是贵族子弟成才的高级阶段,它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修己治人”之才的使命,这使得大学成为周代国学最重要的部分,以至于人们有时把国学与大学教育等同起来。

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

后代的国家教育,明显受到国学的影。周代以降,为了教育王公官僚子弟和平民俊秀,培养人才,各朝代都重视设立国家教育机构和学校。其中,汉代有大学;晋武帝又设国子学,以与原有的太学并立;北齐大学的学学生称为“国子”,主要是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之嫡子,他们皆贵族子弟,以与乡学中的平民子弟相区别。子弟八

校,秉承了周代国学的职能。如果说,周代国学的教育内容是礼乐文化,那么,周代以后国学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如汉代太学,主要教授《周易》《尚书》《诗经》《周礼》《春秋》五经;唐代太学、四门、国子学的生徒要学习《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尚书》《周易》《孝经》《论语》等经,闲暇时还可兼习《国语》《尔雅》;北宋国子监的课程和教材有:《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等;南宋时国学教材在北宋经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朱子的《四书集注》和《仪礼经传通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程颐的《易传序》和《春秋传序》等;明、清的国家考试以“四书五经”为主,学校的课程和教材也主要是“四书五经”,而且“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颐的《易传》、朱子的《本义》;《书》主蔡氏《传》;《春秋》主《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主古注等等。可以看出,秦汉至明清,国家的最高学府名称虽各异,学生所学的课程和教材亦有变化,但它们基本秉承了周代“国学”作为国家教育机构和学校的原义,其作为教材的儒家经典,实际上与周代的

“礼乐文化”一脉相承。一句话,在古代,国学就是国家办的高级教育机构和学府,其教育的核心是周、孔为代表的儒学传统和文献,其目标是培养修己治人的人才。

近代以后的国学嬗变

进入近代,国学的内涵发生了嬗变,国学不再是指国家的教育机构和学校,而是指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总体,其间并有“中学”向“国学”转变的分际。19世纪中叶,裹挟着军事经济强势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并冲击着中国固有的文化。由此,古代的“华夷之辨”转变成“中西之辨”。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中学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实现富强,使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以魏源、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以及以王韬、郑观应、黄遵宪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主张在坚持孔子之道的同时,学习西方的技艺器用,他们的主张后来被提炼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论。其中的“中学”,就是指以孔门之学为“中国固有的学术,它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工商法律等知识相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章太炎认

为,国学是国家成立的根本,国学亡而国必亡,国学兴而国自立,国学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存亡相依。章太炎指出,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总称,它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相对于“中学”,此时的国学已无“以孔门之学为主”的强调。而章太炎的国学观,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20世纪知识界对国学的基本看法。当然,由于中国固有的学术和文化,其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因此,说到国学的具体内容,以胡适为代表的“反传统派”和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传统派”便出现了分歧。反传统派心目中的国学内容,侧重于古代文学史、史学考据文献及诸子作品;而传统派心目中的国学内容,主要是指影响中国人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儒家经典。就学习国学之目的,反传统派是要清理一段中国的历史和学术史,批判传统儒学的弊病,从中寻找几点与西方现代学术相契合的“真价值”,以便接引西方的知识,在中国“再造”现代文明。相反,传统派研究国学之目的则很明确,他们相信中国固有学术的道德和精神价值,希望人们熟读儒家经典,体验其中的“活灵魂”,并以此修身践履。

概念和内容在不断变化

由上可知,国学的概念及其内容不是静态的、不变的,而是

动态的、变化的。然而,除“反传统派”外,人们对国学的看法,在不断变化中有一个不变的红线:即不论是周代的官学、中世的士大夫,还是近代的“传统派”,人们把国学当作塑造中华民族独特生活方式和基本价值观的载体,它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传统,这就是国学的内核所在。

如果明白了国学的内核,今天我们国学、读国学,面对的就不是让人畏惧、无处下手的中国学术文化的总体,而是以儒学为主干,在研习四书五经的基础上,适当可以旁及先秦诸子、佛道之书及诗词文史。兹不揣固陋,列一国学书目,以供普通读者参考: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墨子》、国学漫谈《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史记》《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楚辞》《文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唐宋文选》是也。

(来源:《光明日报》王银) 小标题为本报所加

